

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友兰

人民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新编

第五册

冯友兰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倪天煦

中国哲学史新编

ZHONGGUO ZHEXUESHI XINBIAN

第五册

冯友兰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18,000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92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5,201—8,200

ISBN 7-01-000088-3/B·19 定价 7.00 元

第五册 自 序

自从1980年我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之后，到现在已经6年了。这是我第二次从头开始写《新编》了，从前出版的那两册《新编》别称为“试稿”。其所以称为“试稿”，因为其中有些地方有依傍别人的地方，是从道听途说得来的，不是直接亲自见到的。自己亲自见到的，不一定就正确，但必须根据自己亲自见到的，说出来才有力量，写出来才有价值。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修辞立其诚”。这是我在第二次从头写《新编》时所定的一个目标。

目标虽然定了，但是具体怎样做，当时还没有把握。路是人走出来的，走了这几年，总算走出了一条路来了。

哲学史是“哲学”的历史，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历史。哲学史的对象是“哲学”，不是人，罗列人名不能算是哲学史，只能算是人名录，点鬼簿。

哲学的发展总要围绕一些真正的哲学问题，哲学史必须说明这些问题。不能仅只对于某些哲学家的著作解释词句，咬文嚼字，那只能作出一种资料汇编，不是哲学史。

根据诸如此类的认识，大约10年之间就写出这5册《新编》，全书共7册，还有两册没有写出来，但是书的体裁已经定型了。照这个体裁，书不以人为纲，以时代思潮为纲；以说明时代思潮为主，不以罗列人名为贵。每一个时代思潮都有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成为讨论的中心，哲学史以讲清楚这个问题为要，不以堆积资料为高。

全书讲7个时代思潮:先秦诸子(分前后期),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分前后期),近代变法,现代革命。这是客观的中国哲学史的7个中心环节,也是客观的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自然格局。所谓自然格局就是说,这不是从别的地方搬过来,硬套上去的。

哪一个时代思潮的哲学中心问题讲清楚了,这个时代思潮的来龙去脉也就清楚了。如果能把这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情况说清楚,那就更好了。不过这一点现在很难完全做到,因为这一方面的问题太复杂了。现在我希望能够比较完全做到的,是在哲学问题上比较完全地说明了一个时代思潮的来龙去脉。能多少做到这一点,就觉得所写的哲学史简明得多了。这样的体裁对于所写的哲学史有提纲挈领、提要勾玄的作用。在我开始写《新编》的时候,我本来打算在有些地方增加篇幅,可是后来并没有增加,反而比两卷本的篇幅有所减少。

我写书的时候,有些地方本来只是一种设想,在写的时候用材料证实。在设想被材料证实的时候,常觉得和古人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有一种很大的快乐。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读书乐”吧。

以上所说的未免有自吹自擂之嫌,但如“读书乐”之类,本来是只有自己可以感觉到的。正象禅宗所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至于提纲挈领、提要勾玄之类,那是客观的效果,有待于读者评论了。

本册写作的过程得到陈来博士、张跃同志的帮助,朱伯昆教授也看过稿子。乘此出版机会,谨向他们致谢。

冯友兰

1986年12月

目 录

第五册 自序	1
第五册 绪论	1
第一节 从地主阶级贵族到“四民之首”	1
第二节 士与知识分子阶层	5
第三节 士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	6
第四十九章 通论道学	9
第一节 什么是道学	9
第二节 从比较哲学的观点看道学的特点	12
第三节 道学的目的和方法	17
第四节 道学的发展阶段	19
第五节 道学的名称	20
第六节 道学的历史作用	24
第五十章 道学出现的政治条件——庆历新政和熙宁 变法	26
第一节 军阀和士的联合专政	26
第二节 当时变革的必要	28
第三节 庆历新政和范仲淹的改革“十事”	30
第四节 庆历新政和李靓的《周礼致太平论》	32
第五节 “熙宁变法”和王安石的“新政”	40
第六节 道学的兴起	47

第五十一章 道学的前驱——周惇颐 and 邵雍	50
第一节 谁是道学的创立者?	50
第二节 周惇颐的《太极图说》	52
第三节 周惇颐的《通书》	60
第四节 周惇颐论“孔颜乐处”	64
第五节 邵雍的“先天学”	67
第六节 邵雍的世界年谱	72
第七节 《皇极经世》的《观物内外篇》	77
第八节 对于周惇颐 and 邵雍的图象的两种了解	83
第五十二章 道学的奠基者——二程	88
第一节 二程的家世 and 经历	88
第二节 二程对于王安石新法的态度	91
第三节 天理 or 理	101
第四节 气、心、性、情	107
第五节 程颢的《识仁篇》 and 《定性书》	111
第六节 程颐的《易传序》	119
第七节 二程的“气象” and “孔颜乐处”	121
第五十三章 道学的奠基者——张载	125
第一节 张载的生平及其著作	125
第二节 发挥唯物主义的“有无混一”论	126
第三节 发挥辩证法的“二端”论	130
第四节 张载的《西铭》与人的精神境界	136
第五节 《正蒙》的《大心篇》与为学之方	138
第六节 《正蒙》的《诚明篇》与为学之方	142
第七节 张载的政治社会思想	149
第五十四章 朱熹	154
第一节 北宋道学所引起的哲学问题	154
第二节 朱熹的生平及其著作	156

第三节	理, 太极	159
第四节	气	164
第五节	朱熹的宇宙形成论	168
第六节	性、心、情、才	172
第七节	修养方法	177
第八节	“王霸之辩”	183
第九节	朱熹易学中的辩证法思想	186
第十节	前期道学的高峰	196
第五十五章	陆、王心学的兴起	198
第一节	陆九渊对于“无极而太极”的批评	198
第二节	陆九渊的宇宙观和修养方法	202
第三节	鹅湖之会和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	205
第四节	王守仁的《大学问》	208
第五节	“致良知”与“知行合一”	214
第六节	“良知”与“爱有差等”	218
第七节	“良知”与“动静合一”	220
第八节	从哲学上看理学和心学的异同	222
第五十六章	道学外的思想家——陈亮和叶适	227
第一节	陈亮的政治态度	227
第二节	陈亮的社会思想	228
第三节	陈亮对于程、朱“形上”和“形下”的批评	230
第四节	陈亮和朱熹关于“王霸”问题的辩论	234
第五节	叶适的政治态度和社会思想	237
第六节	叶适的哲学思想	238
第七节	陈亮和叶适重商思想的社会根源	244
第五十七章	气学的复兴和理学的自我修正及革新	246
第一节	王廷相对于道学的态度	246
第二节	王廷相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247

第三节	王廷相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251
第四节	王廷相对于心学的批评	252
第五节	罗钦顺对于心学的批评	254
第六节	罗钦顺对于理学的修正革新	256
第七节	王廷相和罗钦顺在后期道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259
第五十八章	心学的发展	260
第一节	杨简的《己易》	260
第二节	王畿的“四无”说	262
第三节	李贽的“童心”说	265
第五十九章	后期道学的高峰——王夫之的哲学体系	274
第一节	论客观世界的真实性	274
第二节	关于“有”、“无”的问题	275
第三节	关于“动”、“静”的问题	277
第四节	关于“形上”、“形下”问题	278
第五节	关于“理”及其各项对立面	279
第六节	王夫之的认识论及其对心学的批判	284
第七节	关于知行问题	286
第八节	关于“性”、“命”问题	288
第九节	王夫之的历史观	289
第十节	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	291
第十一节	王夫之哲学思想的局限性	294
第十二节	王夫之的著作的幸与不幸	297

第五册 绪 论

在第四册绪论中，本书阐述了门阀士族的兴起和发展，指出：所谓门阀士族，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主阶级贵族。从魏、晋至梁、陈，中国社会是由军阀和门阀联合统治的。隋唐以后，门阀士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逐渐降低，由地主阶级贵族降低为“四民之首”。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个显著变化。所谓“士”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阶层。作为“四民之首”的这个阶层，一直到清朝末年，都被称为“书香门第”或“读书人家”。

第一节 从地主阶级贵族到“四民之首”

在人类社会中，阶级与阶级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经常有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必须解决，然后社会才能存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到现在，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民主投票，少数服从多数。在这种办法还没有实现以前，社会中的斗争和矛盾只能用武力解决。掌握武力的人就是军阀。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每一个朝代都是一个掌握武力的人所创立的。由这个意义说，他们都是军阀。他们掌握武力，又善于使用武力，战胜了反对他们的人。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自立为皇帝，创立了他们的朝代。在魏晋至梁陈时期则是这些军阀联合门阀士族进行统治。

在这种联合统治中,作为皇帝的军阀的政治地位是最高的,可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他们的社会地位反而没有门阀士族高。相对地说,他们地位是低了,门阀士族的地位是高了。这在当时社会中的婚姻关系上可以看出来。社会中的婚姻必须门第相对,身份相当。上册绪论中说的李络秀一例,可以概见。这种风俗残余在唐朝还继续存在。《新唐书》说:“开成初,文宗欲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谓宰相曰:‘民间脩昏(婚)姻,不计官品而上(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诏宗正卿取世家子以闻。”(《杜中立传》)所谓“不计官品而上(尚)阀阅”,就是说,不以皇帝所任命的官吏为贵,而以士族的门阀为高。崔氏和卢氏是当时的门阀士族,唐文宗想把两位公主嫁给当时的士族,还算是高攀,所以向宰相发牢骚,说:“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唐朝初年,“太宗尝以山东士人尚阀阅,后虽衰,子孙犹负世望,嫁娶必多取贵,故人谓之卖昏(婚)。由是诏士廉与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责天下谱谍,参考史传,检正真伪,进忠贤,退悖恶,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进旧望,右膏粱,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为九等,号曰《氏族志》,而崔干仍居第一。帝曰:‘……今谋士劳臣以忠孝学艺从我定天下者,何容纳货旧门,向声背实,买昏为荣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为公、卿、大夫,世世不绝,此谓之门户。今皆反是,岂不惑耶?朕以今日冠冕为等级高下’。遂以崔干为第三姓。”(《新唐书》卷九十五《高俭传》,参看《旧唐书·高士廉传》)《新唐书》的这一段,明确生动地叙述了唐初皇室与门阀士族斗争的情况。当时门阀士族虽然已经衰落,但是他们的社会影响还是很大。在婚姻方面,如果非门阀士族的人家想与士族通婚,就要多拿彩礼,唐太宗对这种情况很厌恶,叫高士廉等人作《氏族志》,可是高士廉等人仍以崔氏

为第一等。太宗当然不满，又重申了他的意思，强调“立德”、“立功”、“立言”，贬抑旧门阀士族，抬高新氏族，叫他们作了修改。然而直到文宗时，还有皇室不及崔、卢那种情况，可见门阀士族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影响是不容易改变的。这就是为什么皇室向门阀士族求婚，还有高攀的意思的原因。

郑樵对这种情况作了一个概论，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籍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通志·氏族略序》）

郑樵在这里所说的，就是阶级社会中贵族和非贵族的分别。他所说：“贵有常尊，贱有等威”，就是这种分别。他认为，自隋、唐以前中国社会中是有这种分别的，隋、唐以后就没有这种分别了。这是他的特识。不过，他认为隋唐以前的那些贵族都是自古传下来的，这就错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把战国时期的贵族都夷为平民，和原来的平民统称为“黔首”。在他的统治之下，只有他一个人的子孙，可以一代一代地世袭为皇帝，其余的人都没有世袭的资格了。自古至秦，世世代代传下来的那些贵族都消灭了。汉以后，又出现了门阀士族，实际上也是贵族，但那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它们和先秦的贵族也有本质的不同。先秦的贵族是奴隶主贵族，是奴隶社会中的贵族。魏晋的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贵族，是封建社会中的贵族。

郑樵把“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作为五代以后中国社

会的特点,可谓扼要。还应该知道,“取士不问家世”是原因,“婚姻不问阀阅”是结果。前者是军阀打击门阀的一种策略,后者是这种策略的胜利。无论如何,从宋以后,在中国社会中就没有(门阀)士族而只有士了。(门阀)士族是玄学的阶级根源,士是道学的阶级根源。两者比较起来,玄学有一种华贵清高、风流自赏的意味,道学则有一种比较平易近人的意味。这是贵族与非贵族不同的表现。

隋、唐间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的情况,本书在第四册绪论中已经讲了一些,在这里不再重复。

门阀士族的政治社会地位实际上是世袭的,每传一代,地位就加固一点。当时的朝代都是很短的,每一个朝代的皇室往往只传一两代。一个军阀凭着他所掌握的武力取得了政权,自称皇帝,建立了新朝代。等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当了第二代皇帝。原来的第二号军阀欺负新皇帝年幼无知,凭着他所掌握的武力,从新皇帝手中夺取了政权,又自称皇帝,建立了又一个新朝代。在中国的这一段历史中,经过魏、晋、宋、齐、梁、陈,都是这样一起一落的。经过的朝代虽然不少,经过的时间可是不长。各朝代的皇室互相残杀,互相诋毁。每一个新朝建立起来,都把旧朝的幼主说成是昏乱不堪。新朝代建立起来后,旧朝代的皇室不仅失掉了政权,而且社会地位也跟着降低了。新朝代的皇室,政治地位是高的,但是与门阀士族比社会地位是低的。

隋朝统一了中国,打算改变这种情况,打击门阀士族的社会地位,其主要措施是实行科举取士的制度。他们知道,门阀士族之所以成为门阀,是由于从汉以来,实行征辟制度。于是不用征辟,改用考试,这就是所谓科举。在科举制度下,地主阶级不当权派必须参加皇帝所举行的考试,通过考试才能取得掌握国家机器的权力,

成为当权派。用考试办法，皇帝可以直接用比较机械的办法拔取他认为是合适的人，地主阶级不当权派，及他们的知识分子，也可以用一种比较机械的办法进入社会上层，掌握国家机器。这是一种比较平等的办法，因为社会上除极少数人外，都可以参加考试。这也是一种比较公正的办法，因为考试去取的标准，相对于当时的情况说还是比较客观的。相对于当时情况说这是一种比较平等客观的沟通社会上、下层的渠道。所以隋、唐以后，经过宋、元、明、清，历代都实行科举制度，而且每一代都加以完善。从实行科举制度以后，门阀士族就逐渐消灭了。唐太宗站在端门上，看到“新进士缀行而出”，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这就是说，作为皇帝，他把知识分子阶层都掌握起来了。从此以后，社会上就只有作为皇帝的军阀，而没有像为地主阶级贵族的门阀了。

宋朝时科举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宋太祖说：“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路，甚无谓也。今朕躬身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六《宋太祖开宝八年》）这是说，唐代的科举制度还有依靠门第录取的，这完全不合科举的本意，所以“甚无谓也”。他要求更加完备科举制度，使“孤寒”得以上进。所以，宋朝的科举制度越来越严密，一直实行到清朝末年。

第二节 士与知识分子阶层

士和知识分子阶层，这两个名词并不完全相当。后者只有社会学上的意义，前者兼有伦理学上的意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个士的道德标准。这个标准各家不同。因为儒家是中国封建社

会的正统思想,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的道德标准,就是儒家的标准。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仁是儒家所认为的最高精神境界,有这种境界的人,就是一个完全的人,即所谓“完人”。孔丘把完人做为士的标准,这可以算是最高的标准了。《礼记》中的《儒行》特别着重士的独立自主的品质,其中托为孔子的话塑造了一个士的具体形象,说:“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知识分子当然需要在才学方面有足够的准备,才能为国家社会服务。但是,他的行动只能出于他自己的意志,不受强迫,“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些都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士的标准的内容。并不是一般的士都能达到这个标准,但是他们都承认这个标准。特别是“士可杀而不可辱”,为人们所传诵。

第三节 士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

在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动摇的时候,黄宗羲写一部《明夷待访录》,为他所理想的未来的新社会的上层建筑画了一个蓝图。照他所想的,在政治机构中,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个是皇帝,第二个是宰相,第三个是学校。黄宗羲仅知道中国之外还有西洋,并不知道西洋的历史,更不知道西洋的政治制度。可是他的这个设想使人联想到西方政治机构中的君主、内阁和议会。他怎么会把学校也拉扯到政治机构中去了呢?原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阶层是一个政治力量。学校是知识分子集合的地方,如果爆发为群众性的运动,力量就更大了。在魏晋时代,司马昭要杀

嵇康，太学生数千人出来，要求司马昭任命嵇康到太学当他们的老师。这是一种群众性的抗议。在宋朝，当金兵打到开封的时候，太学的学生出来要求抗战。有一个宋朝人写的笔记，很详细地记叙了当时的一次学生运动的经过。据他说，在南宋定都在杭州的时候，外省的知识分子聚集在杭州，原来杭州的府学，实际上成为太学。学生们评论国事。政府中的人觉得他们很讨厌，有人建议只准在杭州有户口的学生留下，其余的都离开杭州。学生们反对，指出这是像战国时秦国的“吏议逐客”。他们的抗议没有发生效力。被迫离开杭州的学生，约定一个日期，到期都带着行李，背着书，排成队伍走出来。还发了一篇《告先圣文》，只有34个字，说：“斯文将丧，呜呼天乎！吏议逐客，呜呼人乎！乘桴浮海，呜呼圣乎！迨世无闷，呜呼士乎！谨告。”学生还散发诗歌，有一首诗的最后两句说：“我今束书归天涯，不惜一去惜国家。”

当然，黄宗羲还有他自己的经验，明末反对宦官的东林党就是一个知识分子集团，其根据地是东林书院。黄宗羲父子都参加了这个集团。在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开始崩坏的时候，康有为在1897年乘各省举人到北京参加会试的机会，串联两千多举人，上书光绪皇帝，发动了戊戌变法，这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群众性运动。以后，新式学校办起来了，学生的政治运动（当时称为学潮）更时常出现，1919年的“五四”运动尤为显著。

从黄宗羲以前及其以后的中国历史看，“士”是中国社会中的一种政治力量。黄宗羲把学校排在与君相并立的地位，这是有根据的。

当然，详细分析起来，康有为以后的士和其以前的士有所不同，在其以前的士完全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其以后的士就不完全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了。不能期望以前的士有反对地主阶级的

行动，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反抗斗争精神，表现在反抗当时政治上的不良倾向。在中国历史中，皇帝的大权往往旁落在外戚和宦官手中，使政治陷于混乱。士的政治力量往往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黄宗羲的东林党就是以反抗宦官而显示出土的力量的。

再总括几句：从隋唐以后，士就不是地主阶级贵族，而只是“四民之首”了。他们掌握知识，继承文化，其中一部分可以凭藉科举的渠道上升为掌握国家机器的官僚，是封建官僚的预备军或后备军。其不愿应科举考试或者考试中失败的，留在民间，或从官场中退出来，回归乡里，成为一种在野派。在野派是政府的反对派，时常对政府提出批评、表示异议，当时称为“清议”，这种士当时称为“清流”。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与西方接触的时候，首先倡议接受西方文化的人是知识分子；在革命时期，首先鼓吹革命的人也是知识分子。可见，士在中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

在精神境界方面，士还有更高的理想，周敦颐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通书·志学第十》）这就是士所希望达到的一层高于一层的精神境界。对于这些境界的阐述以及达到的方法，就是道学的内容。